
福克斯“数字劳动论”的理论 旨趣与内在逻辑

——对“泛化”批评的一个反批评

李雪阳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宗教研究所, 广州 510635)

摘要: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了包括“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生产方式包容论”及“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等理论在内的考察数字劳动的“理论工具箱”, 由此赋予了数字劳动一种广义界定。然而, 这一理论界定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处在“泛化”批评的风暴之中。事实上, 此类批评是有失公允的: 一方面, 其仅仅片面强调生产力层面, 缺乏对生产方式的辩证思考; 另一方面, 其未能充分理解福克斯的主要任务是力求对数字劳动作出某种“透彻”理解, 而非仅仅求取一个定义。更重要的是, 此类批评选择性地忽视了福克斯考察数字劳动的根本目的——探索如何切实推动一场告别异化状态和资本剥削的革命, 使数字劳动焕新为数字工作!

关键词:数字劳动; 福克斯; 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 生产方式包容论; 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5)12-050-10

与社会非连续性论, 如“后工业社会论”“知识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网络社会论”等思潮倾向于从生产力层面对数字劳动作出阐释有所不同,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以行业而不是以职业定义为基础, 从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视角出发, 将处于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链不同时空中的多种具体劳动形式悉数归入数字劳动范畴, 从而得出了对数字劳动的一种广义理解。不过, 自提出以来, 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这一广义理解就始终处于争议的风暴之中, 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批评, 就是将福克斯的广义界定视为一种脱离了数字劳动原初意涵且显著“泛化”的错误概念^①。事实上, 将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理解贬抑为一种显著“泛化”概念的批评, 一方面, 属于不自觉地站在了社会非连续性论的立场上, 缺乏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理论的辩证思维, 只是一味地强调聚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层面, 忽视了社会客观实存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另一方面, 此种批评并未充分理解福克斯考察和分析数字劳动的主要任务, 是力求对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的理解(而非仅仅求取一个关于数字劳动的简单定义), 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切实推动一场告别异化状态和资本剥削的革命, 使数字劳动焕新为数字工作^②。正因如此, 此类批评不仅流于肤浅与混乱, 而且彻底丢掉了福克斯为深刻、全面、系统理解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所提供的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生产方式包容论”^③和“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为核心的“理论工具箱”。

收稿日期: 2025-10-15

作者简介: 李雪阳,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一、“信息社会”抑或“资本主义社会”——“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社会论”的提出

1968年,即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出版前六年,西奥多·W.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在德国社会学年会上做了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的主题发言。阿多尔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处在一个依然由资本家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是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全部消退的崭新工业化社会里?今天,在阿多尔诺提出这一诘问的五六十年后,福克斯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模仿阿多尔诺曾经的口吻再度质问道: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信息化社会,还是依旧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

福克斯自己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首先回顾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类截然相反的看法。其一是社会连续性理论的看法。社会连续性理论始终质疑社会非连续性理论所描绘的根本性变化。具体来说,其温和派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力层面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有限的、局部的变化,并将当代社会冠以数字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主义、高科技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等称谓;其激进派则明确断言,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出现任何新型的生产方式,进而激进派将基于社会非连续性判断之上的后工业社会论、知识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网络社会论等思潮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其二是社会非连续性理论的看法。该理论强调,当代资本主义数十年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本质性巨变,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对于这一所谓的崭新历史阶段,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称之为程序化社会,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社会(或知识社会),曼努埃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称之为网络社会。

实际上,福克斯既反对(极端)社会连续性论(此类观点在揭示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根本性质之余却坚称并“没有出现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更反对所有社会非连续性论。在福克斯看来,以“后工业社会论”“知识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网络社会论”等思潮为代表的社会非连续性论的优势无疑是明显的,其敏锐捕捉到以社会生产力进步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的一系列新近变化,进而将这些新近变化抽象化、观念化、体系化,并最终形成了系统理论,从而不仅有利于人们准确把握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且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有效预判经济—社会的未来基本演进趋向。不过,社会非连续性理论的问题亦是明显的:它不仅忽略了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客观实存及其蕴藏的巨大能量,而且处处透露出一种对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盲目乐观与狂热崇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的互联网拜物教就是典型例证,其深信仅凭信息和通信技术就能创造一个全新而美好的世界),社会非连续性理论甚至认为,仅凭社会生产力的单线演变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等就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动发生某种(或局部或根本的)变革。“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80)称第三次浪潮社会(即‘知识时代’)是‘一波骇浪,为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源动力’,是‘巨大的历史变革’,是‘惊人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前进’,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1969/1992)认为,‘知识社会’意味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非连续性时代’,‘20世纪最后十年间的工作和劳动力、社会和政体,在布局分布、经历过程、面临问题、层次结构等方面,都与20世纪初以及人类过去的历史有着质量和数量上的本质区别’。对于尼克·斯特尔(Nico Stehr, 1994)而言,他所说的知识社会的产生意味着‘劳动和财产时代的终结’,‘知识社会的崛起标志着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一种经济活动的新结构和组织诞生了’。曼努埃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 2000)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意味着‘新世界在千禧年开始形成’,‘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产生了信息主义’”。^{[1]186,187}更糟糕的是,此类盲目乐观与

狂热崇拜还可能隐藏着一种错误观点,即人类社会的演进存在“两条历史性线索”——“经济所有制线索”(原始共同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生产力技术线索”(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对此,丹尼尔·贝尔就曾经明确表达过:“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一个社会的基层结构)决定并包罗了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而且,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进特征的工业化将扩散到全世界,所以最终会出现全球一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国家差异将会消失,最后只剩下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阶级之间赤裸裸的对抗。我想,现实情况表明并非如此。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把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历史标题之下。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然而,同样的生产力(即技术力量)却存在于大量不同制度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不能说,苏联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化学、物理学)……如果我们以技术的横轴来划分各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就都是工业社会,而印尼和中国都不是工业社会。然而,如果我们以财产关系的纵轴来划分,情况就有差异,美国和印尼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苏联和中国则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集体主义社会。”^{[7]68,69}

同某些(极端)社会连续性论以及所有社会非连续性论不同,福克斯坚持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出发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对当代社会的辨识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作出研析:从生产力层面看,必须承认,相较于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服务生产力等诸传统社会生产力类型而言,以知识和信息技术运用为核心的信息生产力正迅速崛起为一种极其重要且显示着未来发展趋势的社会生产力(尽管其还远未成为一种主流或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力)。这表明,人类正在步入“超工业时代”;从生产关系层面看,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等均未发生实质性、根本性的变革,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依然处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曾经分析过的那种生产关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为了创造更多利润,在生产过程中,科学和信息技术被大量应用”。^{[1]201}福克斯主张,“信息生产力(知识劳动、信息技术、科学和理论知识)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不应该被视作是对立的两极,关于信息社会存在与否的讨论不应降低到生产力水平或生产关系水平。这是因为,如果降低到只在生产力层面讨论这个问题会导致出现这样的假设: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社会——信息社会;而降低到只在生产关系层面讨论也会导致我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我们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也没有改变”。^{[1]201}基于以上判断,福克斯最终得出了一个有关当代社会本质属性认知的崭新概念——“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辩证地回答了他自己仿照阿多尔诺提出的关于人类当前究竟处在什么样一种社会(或时代)的诘问。福克斯指出,“跨国信息资本主义是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发展连续性理论和非连续性理论的产物。剩余价值、交换价值、资本、商品、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这些方式的产生、对象化、积累、流通有其具体情况和历史原因,它们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信息化模式下,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表现为符号化、‘非物质’以及信息商品和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的劳动。数字媒体在跨国范围内协调资本积累、权力、定义产能。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 1993, 55)为了强调扬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区分了‘真正否定、变革否定、激进否定’,并非所有的否定都是最基本的,还有部分否定是变革性的而不是激进性的。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是变革性的否定,不是激进性的否定。”^{[1]191}

毋庸置疑,任何具体劳动形态都是深嵌于一定社会形态(或生产关系)之中的,不可能不受其制约和影响,换言之,任何一种具体劳动形态都必然被所处社会形态(或生产关系)形塑并带有所处社会形态(或生产关系)的鲜明特征。不同于所有社会非连续性理论和某些(极端)社会连续性理论,“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既承认(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确出

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演变和发展,但又否认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进一步提出,对数字劳动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应当像社会非连续性理论那样关注其在社会生产力层面发生的诸多变化,而且应当坚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出发,坚持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和劳动价值论出发^④,充分揭示数字劳动中日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诚如福克斯在一种极度担忧的情绪中所提到的那样:“当学者们诸如尼古拉斯·加纳姆(1998/2003,2002a,2004)、彼得·戈尔丁(2000)和弗兰克·韦伯斯特(1995,2002)反对信息社会假说的时候,他们想提出警告,把当代经济还原为生产力的变化掩盖了持续存在的剥削性的资产阶级关系。该论点是这样的一种还原论,它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赞美当代社会,隐瞒和否认在此社会中所发生的生产力的变化与进步是由剥削关系驱动的。当加纳姆(1998/2004,178)说,‘从能源到智能转变未必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变化;相反,他警告说,生产力的变化不是革命,不必变革,而是要稳定资产阶级制度。……重要的是,要像马克思那样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1]194}

二、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论的颠覆——“生产方式包容论”的提出

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已经迈入以科学技术和信息知识为核心推动力量的“后工业社会”,与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相适应,一种崭新的劳动形态——“非物质劳动”应运而生。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具有高效率、高智商特征的劳动形态。^{[6]143}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一种“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或一种“在生产性合作的起点和商品文化内容的生产中把主体性投入到工作的过程”,^{[5]148}并认为其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劳动活动中,如音像制品的生产、广告生产、时装生产、软件生产、摄影及文化活动等。^{[5]142}奈格里和哈特则尝试从劳动结果(产品)视角界定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提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进而将“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已经被信息化和融汇了通信技术的大工业生产;(2)具有“创造性”和“象征性”的工作;(3)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其要求(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4]286}进而,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将非物质劳动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下述几方面:(1)劳动自主性增强、劳动主体地位有所上升;(2)模糊了或取消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3)劳动关系日趋灵活、流动与不稳定;(4)过度剥削突出;(5)显著的“层级结构性”;(6)劳动社会化程度提高;(7)随着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均质化”;(8)生产组织由传统流水线的线性关系转变为由无数的、不确定的点所构成的某种网络结构。

针对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提出的非物质劳动论,福克斯依据他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深入观察和积极思考,提出:以信息—知识为核心内容的所谓非物质劳动,远非一种彻底的“非物质化”或“去物质化”生产活动。尽管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通过不断修正非物质劳动论来回应种种质疑和诘难,然而,非物质劳动论始终存在着诸多显而易见的理论缺陷。例如,非物质劳动论一直在竭力强调,伴随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活动逐渐表现出“非物质化”“去物质化”的显著特征。然而,所谓的非物质劳动根本无法彻底摆脱物质性因素。首先,非物质劳动的劳动主体(劳动者)无疑是物质性的;其次,非物质劳动的劳动环境、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如办公室、电子设备等也是物质性的;最后,非物质劳动的劳动结果或劳动产品同样必须获得某种物质性载体才能存于世间,如录音录像需要胶片或

磁带来储存、电脑程序需要硬盘等电子硬件来储存(据此视之,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试图从劳动结果或劳动产品视角去界定非物质劳动亦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正因此,福克斯指出:“从工业生产力发展到信息化生产力,信息生产力不是消灭而是扬弃(否定)其他生产力:信息产品的存在需要大量的物质生产,这包括农业生产、矿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信息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没有虚拟化生产或使其无量化或非物质化,而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1]219}此外,福克斯还对社会连续性理论的温和派进行了批评。在福克斯看来,社会连续性理论温和派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的概括和描述,如数字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主义、高科技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等,存在着高估非物质劳动或信息生产力的问题。福克斯认为,在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社会,非物质劳动或信息生产力远未成为一种主流或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力,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或多或少彰显了未来发展趋势的非主流社会生产力类型:“如果你根据资本资产在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分析‘福布斯’全球最大的公司,那么你会发现,近年来金融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共同占据了资本资产的巨大份额;第二大部门是石油、天然气和公用事业;第三大部门是信息部门(包括电信、技术硬件和设备、媒体内容、软件和半导体等分领域)。所以,生产力信息化水平看起来不是全球生产力的主导特征,而是一个重要的、非主流趋势。金融资本如今是资本的主导部分,这表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当今的一个重要特征。石化能源在当代经济中也十分重要,这表明工业社会没有结束,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超工业时代:在这个时代,信息生产、销售和消费成为整个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并没有取代金融资本和石化能源的经济意义。金融化、超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特征。信息企业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重要,反映了信息化的一种趋势(也就是信息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上升),但它们没有金融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重要。”^{[1]197,198}

在辨析庸俗马克思主义同睡鲁·巴纳吉(Jairus Banaji)关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议时,福克斯将上述针对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非物质劳动论”以及将信息生产力视为当前社会主流或主导生产力的学说的反思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他指出:庸俗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阐释为“一种特定生产方式只包含一种特定的历史性劳动方式和剩余价值占有方式,并清除了先前的方式,因此历史发展以线性的方式演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218}这无疑是一种“形而上学—学术形式主义”的机械做法。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反,巴纳吉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作出的解读,即一种特定生产方式“能够包含更早的形式”“在非常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劳动使用形式”,^{[1]218}这种“包容性”解读不仅高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亦高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的实际情况。对此,福克斯阐述道:“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是非辩证地,并不涉及否定,而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从而使一种方式取代另一种方式。……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个阶段都有一个进化的历史发展,因此每一个阶段都消除了前一个阶段(如贝尔 1974 年和托夫勒 1980 年提出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Marx and Engels, 1845/1846)。如果这些方式是以阶级作为生产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就有特定的矛盾,从而导致一种生产方式的否定(扬弃),并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一定要废除而是要否定(扬弃)旧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历史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正是黑格尔对术语扬弃(否定)一词的三重含义:(1)发展(2)否定和(3)继承中发展为(1)有新质的经济,(2)旧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消失了,(3)但这种旧方式以一种特定形式继续存在于新方式中,并与新方式相联系。”^{[1]218,219}

在对巴纳吉“生产方式包容论”表示赞同的基础上,福克斯主要将这一理论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进行讨论。福克斯认为:与巴纳吉所揭示的生产方式包容性特征一样,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一直包含着许多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父权制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等等。“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劳动方式相兼容,从奴役制、佃农、或临时劳动力市场控制,到殖民政权特有的强迫性雇佣劳动以及‘自由’雇佣劳动’(Banaji, 2011)”。^{[1]385}不难看出,福克斯的“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与他在赞同巴纳吉“生产方式包容论”一般普遍性阐释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容性特征的讨论,不仅在思想上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提示人们对数字劳动的考察与分析应坚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出发,在聚焦社会生产力最新演变与发展之余,深入探讨数字劳动所处的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究竟会形塑出一种什么样的数字劳动;福克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的巴纳吉式的解读则启发人们,除了坚持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等方面出发考察数字劳动外,还应充分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包容性特征,坚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其他诸多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家庭主妇式劳动形态、奴隶制劳动形态、封建制劳动形态等)的相互联系出发,来分析数字劳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更为透彻地理解,何以一种看似饱含高新科技因素且远离粗糙物质性生产的“数字劳动”,始终没能摆脱那个古老的、幽灵般的剥削难题的纠缠。

三、“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的提出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缺乏足够有效需求来吸收资本主义剩余的现象,即资本主义消费不足。卢森堡断言,《资本论》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或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并没有很好解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究竟是为了谁而进行的”这一难题^⑤。于是,为了弥补《资本论》中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或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存在的“不足”,卢森堡提出了“资本主义外部论”,即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外部环境才能存续^⑥。在卢森堡看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只不过是对于资本逻辑和资本生产已经全面统治世界这样一种极端情形的理论表达而已,而真实的资本积累必然首先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静态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为实现剩余价值,就要引进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性)“第三者”,即作为资本主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层。针对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外部论”,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曾精辟总结道:卢森堡认为,她已经发觉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一错误使得在没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的情况下,就不可能通过(出售)商品实现那部分用来再投资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资本主义不能够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和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并存。^{[9]61}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大卫·哈维一方面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却又高度赞扬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外部论”,“为了进行积累,资本主义确实需要‘自身外部’的东西”,^{[2]114}借用当前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的语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主义必须创造,而且经常创造其自身的‘他者’”,^{[2]114}“鉴于此,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某种类型的‘外部’东西的观点可谓中肯了”。^{[2]114}立足新的社会—历史环境,哈维继承并积极推进了卢森堡的相关思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外部论”。哈维眼中的资本主义“外部”,一方面,既指一种具有相对固定“地理—空间”内涵的“外部”,如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又指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经济—社会”内涵的“外部”,如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形式及社会阶层。另一方面,还指一种为缓解或推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外部”。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人造“外部”早已不再必然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了,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主要指一切能够为过度积

累的资本实现赢利的机会及场所,如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且与垄断(霸权)资本相对而言的弱势(民族)资本等。对此,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man)在《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总结道:“什么构成资本主义的外部呢?哈维的答案就是所谓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部门。对哈维来说,它们的资源转移到私人之手可以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资源。”^[8]

倘若从“资本主义外部论”出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同各类非资本主义劳动形式无疑将不再表现为彼此互不关联的孤立状态,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资本及其赢利目的为核心的(内在关联且紧密互动的)庞大生产(劳动)网络。正是由于深受“资本主义外部论”以及众多从地理—空间维度考察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以及国际分工问题的思想理论(如哈维的全球化“时间—空间压缩论”、吉登斯的全球化“时空分离论”等)的影响,同时在马克思“总体工人”(或“总体劳动者”)概念的启发下,福克斯推进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容论”并最终形成了有关数字劳动问题的“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信息经济’不是新的、后现代的或根本非连续性的,它具有高度复杂的结构:其中包括各种当代和历史上的劳动、剥削形式,不同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形成一种剥削的辩证法。”^{[1]386}换言之,“‘信息社会’不是新自由主义和管理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全新事物,而且剥削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媒体存在的一个核心方面”,^{[1]221}仍处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信息社会”正“通过多种形式的剥削在运行,是一种综合发展形式。这种形式将‘各种剥削方式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一体化以推动剩余价值的生产’。”^{[1]218}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预设,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劳动,就不再只是沉溺于数字(信息)互联网的无酬型“玩—劳”活动(play-bor)了,倘若从劳动遭受严酷剥削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这一视角出发,数字劳动理应被理解为分布于全球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国际分工链(IDDL)不同时空中的各类具体劳动。对此,福克斯分别从生产关系层面和生产力层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在生产关系层面,为了实现攫取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常常通过下述举措剥削和压迫劳动者:降低工人薪酬,裁减工人数量、缩小工人规模,撤销保护工人的机制、降低工人福利保障,甚至调动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如父权制、奴隶制等);在生产力层面,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资本以跨国生产网络方式将各类具体劳动形式,如农业劳动、工业劳动、服务劳动、知识劳动和用户劳动等联系起来。^{[1]220}按照福克斯的观点,处于跨国信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链不同时空中的数字劳动大体包括下述几类:与 ICT 相关的矿物开采劳动、与 ICT 相关的硬件组装劳动、与 ICT 相关的软件研发劳动、与 ICT 相关的家庭主妇式(泰勒制)服务劳动以及无酬型玩—劳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是相互联系的,这包括矿物开采的奴隶制、硬件组装中的泰勒主义工业化的军事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信息组织与高薪知识劳工贵族的统一、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人、在发展中国家被帝国主义剥削的知识工作者、电子垃圾的工业循环和管理的高风险非正式的物质性电子垃圾劳动。……IDDL 代表着剥削形式的历史和结合。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剥削的历史,这种历史形成并对象化于资本主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组织的核心。……社交媒体产消只是一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并与其他形式的数字劳动联网和相联系,一起构成使数字媒体得以存在的全球剥削生态。是时候拓展术语‘数字劳动’的含义了,它包括了关于数字媒体的存在、生产、传播和使用所需的所有形式的有酬及无酬劳动。数字劳动体现了双重意义上的联系:这是一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层面上的劳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相互较链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组织方式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形成的。”^{[1]385-387}

四、结 语

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福克斯反复强调,他考察与分析数字劳动的主要任务是力求对一个总问题,即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的理解,而为了获得这一总问题的答案就需要进一步对一系列更为基本的问题展开讨论,如什么是劳动?什么是经济价值?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等等。在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卢森堡和哈维的“资本主义外部论”“全球生产分工论”等理论和观点的启发下,福克斯提出了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生产方式包容论”“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为核心、考察与分析数字劳动的一套“理论工具箱”,从而实现了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即对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的理解。

通过深入研析福克斯的“数字劳动论”,不难看出,事实上,那种将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理解贬抑为一种显著“泛化”概念的批评,一方面,属于不自觉地站在了社会非连续性论的立场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只是一味地强调应聚焦社会生产力发展层面,却忽视了社会客观实存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另一方面,这类批评并未充分理解福克斯考察和分析数字劳动的主要任务是力求对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的理解,而非仅仅求取一个关于数字劳动的简单定义。正因如此,此类批评不仅常常流于肤浅,而且彻底丢掉了福克斯为深刻、全面、系统理解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所提出的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生产方式包容论”和“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为核心的一整套“理论工具箱”。更重要的是,此类将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理解贬抑为一种显著“泛化”概念的批评,选择性地忽视了福克斯对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的理解,实际上是服务于其另一个更重要的理论目标——如何切实推动一场让数字劳动告别异化状态和资本剥削的革命,使数字劳动焕新为数字工作!哈维曾经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方案和步骤绝不是某种外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东西,恰恰相反,其必须密切依据现实客观状况,通过对当下境遇中我们所拥有的“现实原料”的切实转变来获取,“那些原料由时空动态来创建和集合,而这种时空动态又是由一套独特的冲突景象(包括压倒性的资本家和商业企业家的景象)所启发……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时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3]186}“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中提取,或者,如左拉所述,从‘丰富肥沃’的众多矛盾体中提取,这些观念可以为具有变革能力的政治学提供基础……对于揭示真正可能性和替代方案的辩证的知识的探询来说,这就是任务所在”。^{[3]202}依靠以“跨国信息资本主义论”“生产方式包容论”和“数字劳动国际分工论”为核心的“理论工具箱”,福克斯实现了其最初设想的对数字劳动及其工作条件作出某种“透彻”理解的任务,换言之,他由此获得了对数字劳动“现实原料”一种较为深刻、全面、系统的理解,这就使得福克斯有可能制定出一套针对数字劳动“现实原料”实现转变的策略。“采用的方法提倡一种广义的数字劳动理解,这种理解以行业而不是以职业定义为基础,其目的在于强调剥削的共性、资本是广大工人的敌人以及为了战胜资本主义的统治必须进行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斗争。”^{[1]6}“数字劳动被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创造之中,这根链条上涉及多种形式的劳动:奴隶采矿劳动、高度剥削的硬件装配劳动、高压力的软件工程劳动、泰勒式和家庭主妇式的服务劳动以及无偿产消劳动。这些劳动形式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用户所看不见的。因为商品将自己作为物呈现给消费者,并隐藏和匿名根本的社会劳动关系。数字媒体是由全球商品拜物教和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剥削形成的。打破数字媒体的商品地位和商品拜物教意味着构建基于数字工作所创造的公有逻辑的工人阶级数字或社交媒体。”^{[1]452}质言之,由于福克斯考察与分析数字劳动的目标所具有的反思批判性同整体革命性(福克斯认为,他对数字劳动的考察与

分析工作同曾经的马克思一样,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非对政治经济学的某种贡献),不难想见,无论福克斯怎样去努力尝试对数字劳动作出某种本质性界定,都无法使那些力求“对政治经济学作出某种贡献、而非对政治经济学展开反思和批判”的人感到舒适和满意。真相是,福克斯实际上对那种醉心于获得一种在“对政治经济学做出某种贡献”意义上的数字劳动界定,进而将这一界定幻变为一种为既定秩序合法性进行辩护以及为既定秩序稳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魔法棒的做法,不仅毫无兴趣,而且还嗤之以鼻。

注 释

- ①此类批评认为:福克斯不仅将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所有活动,如无酬“玩—劳”活动等视作数字劳动,而且更将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相关的一切劳动形式,如矿物开采劳动、硬件组装劳动、软件研发劳动、家庭主妇式(泰勒制)服务劳动等统统视作数字劳动。这样一来,数字劳动概念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其原初界定(即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无酬“玩—劳”活动),并势必“伴随数字技术产业链的不断发展而无限扩大,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切劳动都是数字劳动”。^[1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实际上将所有与信息传播技术产业(ICT)相关的劳动都不加甄别地归为数字劳动,从刚果采集钽矿和钴矿(这两种矿产是生产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必要矿产)的矿工,到富士康工厂的工人,再到印度外包软件开发办公室员工,以及生活在硅谷的IT界精英。但是,这样的归类,实际上将数字生产方式下的数字劳动与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劳动混为一谈,比如刚果的矿工实际上是在地方军阀控制的类似奴隶制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很难与数字化的数字劳动联系起来。分辨是否是数字劳动,并不取决于该劳动是否与ICT产业有关,实际上,在今天的产业生产中,绝大多数产业都不可避免地会与ICT产业相关,但这些劳动并不全是数字劳动。”^[13]
- 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启发下,福克斯严格区分了“劳动”(labour)和“工作”(work)这两个在日常生活中极易混淆的概念:“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里面的一个脚注中指出,英语允许人们做出一个语义的分化:‘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以与work相对。’……劳动是一种必然异化的工作形式,在其中,人类无法控制和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及生产结果。在阶级社会中,劳动是工作的历史组织形式。相比之下,工作是一个所有社会更为普遍的一般概念。工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和社会,从而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14,34,35]
- ③庸俗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解释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只包含一种特定的历史性劳动方式和剩余价值占有方式,而以往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均不复存续。例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一个社会形态中只有唯一一种生产方式。与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解不同,旺鲁·巴纳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生产方式包容论”:每一个社会形态中既有一种特定的主导生产方式,同时也包含了以往的旧生产方式。对此,福克斯阐释道:“生产方式之间如何彼此相关联呢?以历史性的方式来看,它们彼此相互取代,或者以历史逻辑的方法来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它扬弃了旧的社会形态,但却包含了旧的生产方式于自身之中……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一定要废除而是否定(扬弃)旧的生产方式。”^{[1]217-219}
- ④对此,福克斯在批驳那种断言劳动时间对于数字劳动已经不再重要的观点时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对于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来讲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劳动不仅有空间方面,而且也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内。当谈到工作时间、空闲时间、业余时间、工作小时、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分配时间、资本周转时间、生产加速或强化劳动的时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劳动时间对于资本主义来讲至关重要,因为劳动力是商品,所以每秒的劳动都要花钱。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有兴趣使工人工作时间越长越好,工资越低越好,让工人劳动尽可能地强度高,这样就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像穆汉加·卡瓦亚,在枪口下工作并受到被杀害威胁的奴隶矿工工人,他们长时间的工作换来的却是低工资或没有工资,因此,劳动时间的最大化是无偿的。富士康工人的工资相对较低,工作时间很长。富士康试图延长工作日,以提高无偿劳动的总时数……在印度的软件业和谷歌公司中,软件工程师超负荷工作……德国亚马逊的临时工持有临时有限合同,这些合同迫使他们接受、而不是抵制恶劣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害怕失业……时间,在不安全临时就业、工

作时间拓展以及小时工资降低这些形式的案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8-10}

- ⑤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如果从字面上看资本论第二卷末尾的图式，好像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自己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并应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这是马克思在分析他的图式时所给人的印象……在这里，积累是自动地进行着，到底生产是为何人而益加扩大？为哪一些新的消费者而益加扩大？一点也不清楚……这样一来，事情就绕着圈子‘无限地’反复旋转……那么，那些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靠谁人去实现呢？图式告诉我们：是资本家本身，只有他们才能实现。那么他们怎样处置这些日益增大的剩余价值呢？图式告诉我们：他们为了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使用它。从而，这些资本家们就成为一种为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糊涂虫了。他们为了要用来制造新机器，所以反复不断地制造更多的新机器。于是，结局就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毫无目的地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了。”^{[10]257-262}
- ⑥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外部”，即作为资本主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环境”大致包括：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生产形式和社会阶层；第二，全球范围的非资本主义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在卢森堡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同其“外部”的关系始终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单一性，即其主要聚焦西方面向非西方的商品贸易关系。卢森堡认为，为了使贸易关系顺畅持续下去，西方往往会使用政治—军事“暴力铁斧”这一“英勇手段”。^{[11]68}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2]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3]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5] 许纪霖, 刘擎. 帝国、都市与现代性[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6] 保罗·维尔诺. 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M]. 董必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7]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铨,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
- [8] 克里斯·哈曼. 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上)[J]. 唐科,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8(9): 6—12.
- [9] 安东尼·布鲁厄.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M]. 陆俊,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 [10]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彭尘舜, 吴纪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 [11] 罗莎·卢森堡, 尼·布哈林.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M]. 柴金如, 梁丙添, 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 [12] 吕梁山, 张笑宇. 泰拉诺瓦与福克斯——两种数字劳动理论之争的焦点与反思[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4(11): 171—198.
- [13] 蓝江. 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5)上: 76—83.

责任编辑: 景玉琴